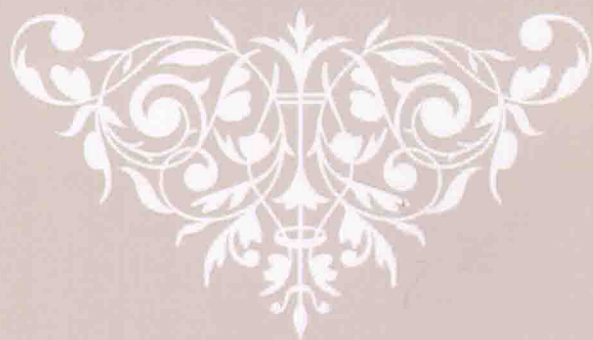


章太炎 晚年学术思想研究

王 锐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

王 锐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王锐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4

ISBN 978 - 7 - 100 - 08965 - 4

I. ①章… II. ①王… III. ①章太炎(1869~1936)
—学术思想—研究 IV. ①B25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58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

王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965 - 4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1/4

定价: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学术前史	11
三、方法与思路	17
第二章 章太炎 1922 年的国学讲演	26
一、初期盛况	28
二、听者渐少	40
三、被忽视的张冥飞记录本	49
四、结 语	57
第三章 章太炎与古史辨派	60
一、扬弃之间	61
二、辩驳之词	71
三、余 论	83
第四章 章太炎与 1930 年代的读经思潮	87
一、1930 年代的读经思潮及其反对之声	89
二、章太炎的读经利弊之辨	98
三、“新四书”之提倡	107
四、结 语	119

第五章 章太炎与民国时期的诸子学论争·····	123
一、洪水猛兽 ·····	125
二、治子与治经 ·····	137
三、玄谈与致用 ·····	147
四、结 语 ·····	154
第六章 朱希祖对章太炎学术思想之诠释	
——以《章太炎先生之史学》为中心的探讨 ·····	157
一、“六经皆史”与“六经皆史料” ·····	159
二、古文经学与社会科学 ·····	168
三、民族主义之史学 ·····	180
四、结 语 ·····	190
结 论·····	194
附录一 章太炎晚年之“求是”与“致用”论探析 ·····	200
一、“求是”与“致用”之再认识 ·····	201
二、致用之学的提倡 ·····	210
三、结 语 ·····	219
附录二 章太炎晚年史学思想略论·····	221
一、读史以救世 ·····	222
二、对新史学的批评 ·····	230
三、余 论 ·····	240
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52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缘起

在近代中国,要推列出对中国传统学术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且立论能成一家之言者,章太炎无疑可以算是其中翘楚。他诂经覃史,董理诸子,以阐扬国粹为己任,并且视野开阔,不落入一味守旧的窠臼。其自言:“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①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他注意对西学的阅读与吸收,在早年求学期间所著的《膏兰室札记》当中,便多借用西方自然科学理论来解读先秦古籍中的相关知识。后因排满革命,东渡日本,复广猎西书,翻译日本人岸本武能太所著之《社会学》,以期借此察往知来。在他所立志要完成的《中国通史》写作中,所注重者便为“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② 显示出以新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雄心。此外,章太炎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晚周诸子,通过比较,衡其高下,立论之语,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国故论衡》当中的诸子学九篇与在东京国学讲习班上的讲词《诸子学略说》,早已成为子学研究领域内的典范之作。民国以来诸子学研究蔚然成风,先秦古学被重新

① 章太炎:《与人论国学》(1908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② 章太炎:《与梁启超》(1902年7月),同上书,第42页。

发掘,摆脱清人重考证、轻义理的诂订之学,章氏实有导夫先路之功。此外,他晚年深感现代教育体制弊端重重,大学之中难以培养真正的大家,并且深受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之刺激,遂力主恢复中国古代书院讲学传统,主张治学之根基在于广泛阅览旧籍,以打下扎实的基础。于是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登台演讲,指导后学治学门径。“入学者,除苏地以外,沪、杭、宁诸地学者,咸来听讲。中有学者教授以及各大学讲师,中学教师,也有中文系学生等,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挤满了人。”^①培养出了诸祖耿、朱季海、王仲荦、姚奠中等一大批文史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章太炎的早年与晚年,虽然在治学重点与学术思想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他对通过学问以鼓舞民气、延续文化命脉的重视,终其一生,并无变化。

然长期以来,章太炎的生平活动与思想见解被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段。早年与中年,他奔走于排满革命,写下了不少充满战斗性的政论文章,此外,辨章学术,以新的视角来整理中国数千年之“国故”,并且以域外之学新解禹域旧章,写出了《齐物论释》等剖析哲理的经典之作。与此成为鲜明对比,中年以后,及至晚年,其风光之形象日渐黯淡,在政治上与各路军阀往来频繁,广州国民政府北伐之时,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显示出十分强烈的排拒之意,早已被披上“反动”的外衣;且学术上日趋保守,从革命斗士退化至“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②变为先进文化之反面。且不说鲁迅对乃师晚年的八字评语“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几乎已经成为对章太炎晚年评价的定论,就连

① 沈廷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300 页。

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 册第 547 页。

论学向以平恕著称的金毓黻,也在1920年的日记当中认为:“章太炎氏之学,精约独至,前无古人。考其成功,乃在流离颠沛之时,迫而后出,亦缘忧愤。及至近三、五年,处境渐亨,著述之业,转见衰歇,间有言论,乃近政客。”^①早岁晚景,毁誉之别,宛若天壤。在这种评价思维之下,对章太炎的研究也就呈现出非常不平衡的状况:早年事迹与思想受人关注,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分析;而其晚年,则有意或无意地被“冷落”,有所论列,也多是沿袭套路,众口一词。1980年代朱维铮先生曾经指出:“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的章太炎研究已有相当成绩……然而,最大的薄弱环节,莫过于对章太炎晚年的研究,虽然材料不算缺乏。”^②时至今日,虽然情况有所改观,然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仍显稀少。

近代中国,政治上波云诡谲,风起云涌,变数甚多。各种政治势力相继登场,种种关系错综复杂。利之所在,或朝敌暮友,或反目成仇,今日的“革命先驱”,或转瞬之间便落得“反动分子”的骂名。个人身处其中,出处进退,极难把握,若涉世不深、心计全无,则往往身陷漩涡而不自觉。所以对涉足政治的人物进行评价,分寸立场,颇费心思,以至于下笔极难。章太炎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或许使得他立功、立言并兼,然而这也为研究者对他生平行事的认识,特别是他与各种政治集团的关系上,增添了许多复杂性。笔者不才,见识有限,于此一方面实难有所评论,只能姑且空出,以俟将来。

不过民国年间复杂的政治格局的出现,也使得各派政治势力对思想与学术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天下乌乎定?定于一。”统一思想、独尊一家,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政权若能达此效果,则离“盛世”之誉已然不远。民国年间政局动荡,各路

①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册第80页。

② 朱维铮:《关于晚年章太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政治势力在争夺地盘、较量军力上大费心思,暂时无暇顾及于道一风同、思想控制,因此让学术得以凭借此一空隙多元发展,学派林立、学人辈出,给后人提供了许多遐想的空间与研究的领域。

近代中国学术虽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是其中显现出一个颇有共性的特点,即趋新。大凡新出之学问主张、思想见解,时常能够让不少人信服,从而在社会上形成比较广泛的影响。这些新出之学,又每每以批判先前的某种理论主张为手段,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新权威。随着新学说、新思想的传播,被其所批判的旧学说、旧思想却渐渐为人所遗弃,以至于对其关注者日渐减少,终成陈言之刍狗、历史之遗迹。

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批新的学人开始执学界之牛耳。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在他们看来,已然成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他的许多观点主张大悖于“科学方法”,以致于对他的批评都变成了“棒打死老虎”。胡适留学归国之初,便感叹:“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以他在美国所学的哲学专业而言,“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①虽然胡适在文中并未明说,但是1915年由章太炎本人及其诸门生编录的《章氏丛书》正式出版,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也算是一件大事,而胡适对此却并不以为然。在后来出版学术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时,他于书后附录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认为章太炎在许多文章中所主张的晚周诸子皆出于上古王官之学“大昧于学术隆替之迹”,遂使得古代学说真相不得大白于世。虽说胡适此文

^① 胡适:《归国杂感》,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册第469页。

仅有一部分内容是在对章太炎之观点进行辩驳,然观其开篇即言“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云云,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他有意以章太炎为目标来进行批判,并且有与章一争高下的意味。^①众所周知,诸子学研究为章太炎治学领域内的一个重点,并且视之为独门绝学。据朱希祖回忆:“先师尝言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惟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矣。”^②尽管胡适自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书时,近人之中最为感谢章太炎,并且初入北大任教之时,曾仔细阅读过章太炎的著作,以致于钱穆认为“其所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一书,称述先秦诸子,大体因承章氏《国故论衡》之意,惟文言、白话有所不同而已”。^③不过随着胡适名声日隆,俨然学界领袖,这些“传承”关系也就不被更多的人所重视,新旧之别,仿佛黑白。

要论与章太炎以及太炎学派的联系,另两位学界闻人傅斯年、顾颉刚较之乃师胡适则更为紧密。二人就读于北大之时,数名章太炎弟子任教该校,所开设的课程当中多讲授章太炎之理论主张。顾颉刚回忆:“民国二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国学会讲学……到这时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子水对我说:‘他这种话只是给初学的人说的,是最浅近的一个门径呢。’这

①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册第184页。

② 朱希祖:《致潘承弼》,转引自姚莫中、董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③ 钱穆:《谈当前学风之弊》,《学庸》,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愿实心实意的做他的学徒。”^①而据毛子水回忆：“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而后来之所以甚是批章，在傅斯年看来，是因为“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是因为对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②傅斯年在这一时期更是仔细阅读了章太炎的著作，曾经详细批注过章氏的学术代表作《国故论衡》。^③

可是后来顾颉刚受到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启发，疑古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开始对上古史事进行全面的辨伪，并对章太炎所宗尚的古文经学之主张进行批判。1930年代初，他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一文，指出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刘歆为助王莽篡汉，对古史系统进行伪造。诚如钱穆所论，虽然本质有别，但是顾颉刚与晚清今文经学实有一脉相承之处：“顾先生在此上，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④顾颉刚与章太炎在学术思想上的渐行渐远，以致于章太炎在晚年的文章与演讲当中，频频强调“经史故实不应无故怀疑”，并且指出：“今《公羊》之学虽废，其余毒遗蘖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⑤当然，这种言论在上古史领域疑古成风的形势之下，自然被视为落后守旧。

傅斯年在1928年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

① 顾颉刚：《自序》，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②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师友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页。

③ 陈平原：《失落在异邦的“国故”》，《读书》2002年第6期。

④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⑤ 章太炎：《汉学论上》，《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册第20页。

对当时学术界“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深为不满。“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两千多年了。”^①傅斯年于此下语颇重,实有深意存焉。当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影响力日微,但他的诸多门生依然在像北大这样的名校中任教,“某籍某系”势力犹存。^②1930年代孙楷第致陈垣信中所言的“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此谓渊源有自”^③便暗指了太炎学派。傅斯年欲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则不破不立,先将他视为落后的学术思想打倒,以收廓清障碍之效。

综上所述,章太炎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影响力日渐减弱。由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学界的影响力,他们的言论都被不少人奉为治学良言,相较而言,章太炎晚年的学术主张在这样的强势话语权笼罩之下,在不断追求趋新的时代风气激荡之下,便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过时,因之关注之人也就越来越少。周辅成在回忆1920年代中期他家乡地区的青年的读书风气时谈到:“在新文学上,彼此却都一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鲁迅、郭沫若、托尔斯泰、高尔基,常常出现在口中。由于这些人物的出现,什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早被青年遗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卷第5页。

② 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孙楷第:《孙楷第致陈垣》(1932年),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37页。

忘了。”^①就连与新派学者保持一定距离的陈钟凡,在1936年所写的《十五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一文里,遍举诸多1921年到1936年间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的著作,其中也并未包含章太炎的任何作品。^②这与晚清之时章氏著作洛阳纸贵的情形形成鲜明反差。

此外,章太炎论学,融贯古今、遍及四部,所包含的信息量非常之大。他为文力求古奥、宗法魏晋,使得许多根柢不深者望而却步。随着新式教育的不断普及,能读懂他著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便是指导治学门径的启示之语,对比那一时期颇为流行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口号式方法论,能够领悟者也着实不多。据曹聚仁回忆,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演讲国学之时,“第一天,与会听讲的有一千二百多人;可是,这盛况是维持不下去的,除了结束那一回,仍有二百多人与会,章师先后讲了十二次(每逢周末下午讲两小时)。平时只有四五十人听讲。听讲的人所以这么少,一半由于章师的余杭话,不太容易懂;他所讲的国学,对一般人实在太专门了。在场听懂的,并没有几个人。沈信卿自己就听不懂,省教育会所请的二位记录,虽是老年人,他们也不懂,所以记不下去。”^③曲高和寡之状,跃然纸上。章太炎1934年致信吴承仕,也谈到“学风败坏,殆难振救。在苏新收学子数人,视前者皆不相及,概根柢素薄使然”,^④大有学问无法传授之困惑。所以对章太

① 周辅成:《我与20世纪》,《论人和人的解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495页。

② 陈钟凡:《十五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510—522页。值得注意的是,陈氏于文中对于民国建立至1921年间章太炎的著作有较高的评价,认为“持论宏通”,“多独到之见”,并非对之全盘否定。

③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下册第277—278页。

④ 章太炎:《与吴承仕》,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

炎晚年学术的关注,便数量甚少。

近代中国,讨论学术,喜作分期,仿佛每一时段,学术各有任务,任务完成,其学便应寿终正寝,其人便可归于古董。新文化运动以来扬名学界的充充诸公,不出十数年,亦成过时。林同济 1940 年代初期宣称,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第一期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所代表的第二期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当下之急务,在于开创学术第三期,较之从前,更有新使命存焉。^①然正如阮元所言:“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②只有将当事人所生活的时代中由于各种风气所造成的主观印象排除,方可更为客观与全面地认识一个时期学术的整体面向。学术史研究才能由此而避免成为“由来只有新人笑”的单线条学术进化史。章太炎晚年所遗留下来的文字不能简单使用“保守”、“落后”,甚至是“反动”等词汇来作评价。论者常言,章太炎晚年公开提倡读经,并且参与孙传芳组织的投壶之礼,这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进步与解放的风气大为相悖。但是章太炎提倡读经,并非简单地将历代官方所划定的经书体系照搬于 20 世纪,他强烈推荐精读《礼记》中的《儒行》,主要就是阐扬其中“艰苦卓绝、奋厉慷慨”之精神,以期中国民众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之时能培养起独立不屈的“任侠”式人格。章太炎于道德论当中尤其注重个人独立,早年著《明独》,强调“群必以独成”,^③这与古代君王借经义以摧民气的做法大为不同。而他对于投壶之礼,虚与委蛇,态度颇为冷漠,赋诗“郑生郑生歌且休,铜马遍地争王侯。九韶如可化蛮越,罗网何事陈戈矛”以为质疑。相

①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载许纪霖、李琼编:《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26 页。

②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章太炎:《馥书(初刻本)·明独》,《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册第 54 页。

比之下,深受新文化“感染”之“浪漫诗人”与“热血作家”,无权之时,标榜理想,痛骂一切;有机可乘,争名争权,滥呼万岁,互相诋毁,无所不能。品格高下,犹堪深思。

此外,章太炎晚年言论颇有对时代学风进行批评之处。著于1924年的《教学弊论》,对新式高等教育深致不满,认为教科书体系之下,学生只务耳学,不务眼学,课本之外,束书不观。这一认识,其实深切时弊,居于今日,回首反思,其眼光如炬,洞察深远,尤为让人佩服。而他所提倡的挽救之道,便是广泛披览历代史籍,重点掌握社会变迁、制度沿革,须将通史大体熟悉,方可从事研究。古人云,不通诸经,不能治一经。同理,若不将相关联的史事了熟于胸,具备全局意识,则所谓研究,狭隘孤陋,在所难免。所以他提倡读史的背后所蕴含的对当时学界(特别是对古史辨派)的针砭,同样值得重视,须将其所论置于具体情境,仔细分析,以此进一步显现出当时学界的多元景象。

复次,章太炎一生,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1931年“九一八事变”极大地刺激了他。随后的讲学、撰文,多受此影响。例如对学术“致用”的强调,提倡通过读史以激发民众的爱国之心,将以“求是”为目的的学问视为不急之务,认为考证远古史事,审定古字古音,校理《墨辩》哲理皆为不合时宜之学。这与他早年之主张,颇有异处,值得注意。而他对经学今古文之间关系的再认识,亦受此影响,不容忽视。

总之,通过对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进行讨论,既可扩宽认识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视角,避免简单地以新旧之名来划分学人,又可对章氏一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全面的认识,从而丰富“章学”的研究领域,使得由于时代原因所造成的将其前后半生截然分开,以致虎头蛇尾的局面有进一步的改观。近阅黄克武先生研究严复之作,黄先生于其中指出:

严复一生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衷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终极关怀相互矛盾、彼此分歧的两面人。他在前后期的思想虽因应时代的变化,有着重点的倚轻倚重,然其环绕着“自由”的内在理路,以及肯定自由所需要的精神基础是前后一致的。在他激进时并未完全放弃传统理念,而在保守稳健的晚年也并未放弃西方的自由、民主。他一贯的追求会通中西,为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①

这种将思想家的一生做全盘性考察的研究思路,以及摒弃只重若干细节而忽略研究对象的基本价值关怀的分析方法,用于对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的论述,亦同样可取。

二、学术前史

关于章太炎的晚年,鲁迅曾作如下评论:“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镞。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罫,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袞,粹然成为儒宗,执贄愿为弟子者慕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②他还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八字作为对乃师晚年的总评价。这一看法,与

①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版,第19页。

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册第547页。

鲁迅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与心态极有关系。他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①由此可见，他与整个太炎学派的关系已经十分疏离。章太炎逝世后，在诸弟子深表哀悼、广为纪念之时，他自然不愿追随大流、亦步亦趋。并且自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一直以激烈的反传统形象闻于世，与章太炎晚年所主张者背道而驰，因此在思想上对乃师晚年颇不认同，师生身份已成陈年往事，唯存于记忆当中。不过此论一出，其背景与所指早已不再为人重视，只剩只言片语，足以资为己用，越出本事，无限放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数十年来鲁迅一直被奉为“旗手”，他对民国学界的片段看法，也自然成为金科玉律，视作定论。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的研究，都是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二语为纲，对之进行注、疏、笺、记而已。所论重点，或者是突出章太炎晚年走向“保守”，敌视一切新思想，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或者是批判他与孙传芳等军阀往来密切，成为彼辈的“座上宾”，为其“反动”行为摇旗呐喊。就算是有所肯定，也只是由于他曾经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进行了批判（特别是《教学弊论》一文），揭示出后者企图抹杀中国历史的“不良”用心。

关于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的评价，除了一些较为“正统”的论点之外，还有着一些更为多元化的视角。钱穆在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时，章太炎尚在世，遂本着盖棺方能论定的缘由，并未在书中对之进行评论。待其逝世后，钱穆便有专文评论章氏学术。在《太炎论学述》一文里，钱穆认为章太炎虽然于中国旧学多有阐释，但核心

^①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册第431—432页。